

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研究

徐木兴^{1,2}

(1. 浙江理工大学 高教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18; 2. 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要: 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具有以下特征: 国民教育为社会改革的根本; 国民教育重在改造国民性, 陶铸理想国民; 国民教育应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杜氏国民教育思想深刻而丰富, 对当前国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杜亚泉; 国民教育; 改造国民性; 理想国民

中图分类号: G40-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09)02-0032-05

杜亚泉(1873~1933), 原名炜孙, 字秋帆, 号亚泉, 又署伦父、高劳, 浙江绍兴会稽县伦塘乡(今上虞市长塘镇)人, 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毕生从事著述和教育活动, 形成了富有启蒙意义的国民教育思想, 对近现代中国国民教育事业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一、国民教育为社会改革的根本

杜亚泉深谙“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的古谚, 坚信国民教育为实施社会改革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最稳妥的调适方法。其在斥责民国“党人争权”、“武人干政”假共和局面之时明确指出, “真共和之成立, 不外二因, 一为国内农工商业之发达, 二为国民教育之普及”。而普及教育, “决非有赖于政治上之势力而后能为之者, 而其对于真共和前途之效益, 实较政治上之势力为大”,^[1] “就中国目前现状而为治标之策, 则必以开通智识为前提, 而尤以普及常识为急务”。^[2]因而他主张社会改革应以通过国民教育提高国民个体素质与觉悟为根本。“是故吾侪今日, 不必讨论吾侪之社会当如何改革, 但研究吾侪之个人, 当如何改革而已; 不必悬视吾侪之社会, 当改革之使成如何之社会, 惟考虑吾侪之个人, 当改革之使成如何之个人而已; 不必叹社会之病弱, 但当求个人之强健; 不必痛社会之荼疲, 但当期个人之振作; 不必悲社会之沉沦, 但个人当自求其救济; 不必忧社会之堕落, 但个人当自高其品格”。^[3]因为“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亦未有分子腐败, 而团体能良好者”, 只有造就有理想、合格的新型国民才是救济社会的根本。同时, 杜氏也清楚地意识到, 国民教育这一治本之策, “非经数十年之陶铸不为功”。但他毅然承担了承传文化、培育新人, 延伸人类社会的伟大使命, 并为其贡献一生。

二、国民教育重在改造国民性

杜亚泉作为民国初年著名的“调适”论启蒙思想家, 认为国民教育, 除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教育以外, 更要针对中国国民性诸种缺陷和不足, 进行合理改造, 以重塑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民族意识相适应的国民性, 以陶铸理想国民。杜氏针对中国国民性之诸种表现, 即“现实之国民”、“无共同概念”之国民、“幼稚而静默”之国民、“乏奋斗之精神”之国民进行了中肯的分析和批判, 提出了基于改造国民性的国民教育具体路径。

(一) 以“理想”、“理性”为基础, 陶铸“国民心理”

针对“扶我则后, 虚我则仇”、“盖全从事实上立论”之“现实国民”特性, 杜亚泉认为陶铸新

收稿日期: 2008-10-10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十一五”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06AII0070176)。

作者简介: 徐木兴(1974-), 男, 江西万年人, 浙江理工大学高教发展研究中心讲师,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

的“国民心理”，首先，要正确界分“事实”与“原理”的内涵。“盖事实问题，以利害为标准；原理问题者，依是非而判别。”我国国民应充分认识理想/原理之重要性，充分审视自身之缺陷，“采欧人千余年来发明之原理，而以事实的心理陶铸之，则今日之所谓原理者，他日未必不若为事实。”^[4]其次，要“惟理性马首是瞻”，但必须以“和平中正”为指导。杜氏有感于“理性”势力之伟大，但亦充分意识到理性常因“惑于暗示，中于感情”等缘由，而易产生“迷误”，从而明确指出，养成国民“理性”，除了“惟理性马首是瞻”外，“纠正理性迷误之办法”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吾人当各澄清其意虑，疏浚其灵明，并养成判别事理审察物情之能力。其次，则凡操维持世道化民成俗之权者，当知人民理性之不可挠，而又不容任其迷误，一方面迎机善导，顺其发展之本能；一方面救弊护扁，匡厥趋向之歧误。“儒者著书，哲人觉世，敷陈学理，启迪颛蒙，为理性之前驱，作人民之先导，务宜力求平正，切中事情，察人民程度以立言，揆世运迁流而立教，毋骛高远，毋尚精深，毋见弹求炙而涉及张皇，毋惩羹吹薤而流于激烈，庶理性得和平中正之指导，而不致偏倚矫切，贻世界以无穷之纷扰也。”^[4]

（二）以“真理正义”导诱国民，形成“共同概念”

杜亚泉认为，所谓“共同概念”者，“非全国上下无或差池，事事物物不容许有少许歧异也。但国民多数，社会中坚，有隐相契合之精神，互为沟通之意见，即能表率余众，发挥效力。纵使大同之中，不无小异，一隅之齟齬，片面之争执，决难尽知，但根本上不相睽隔，则一切冲突，自然融洽，或受其节制，而不致有绝对之背弛。”^[5]由于国民概念之形成，决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善为治理国家之人，“一方面熟察人民之概念，顺其势而善用之；而他方面则又默化迁移，养成人民同一之概念。”^[5]鉴于当时国民“共同概念”之缺乏和全国思想彷徨怅能，不衰一是的现状。杜氏清醒地意识到救济之策“非旦夕所能奏效”，原因在于，“当国运衰颓之际，外来之心理，乃连翩而输入，又不幸而吾人乏冷静之头脑，精密之研究，对此新来之学理，但仓皇惊羨以迎受之，鹵莽灭裂以宣扬之，未尝为有条理之贯穿，有系统之吸收，故国民概念，随蒙其弊。”所以，吾人今后，当力惩此失。凡关于政治社会诸学理，苟非洞明原委，熟审利弊，不宜轻于提倡，率于传播。因“学说之为用，可以启人之灵名，亦可致人于迷惘，”若不能正确地提倡和传播，容易“授人以混淆黑白颠倒美恶之机会”，所以杜主张，“欲国家又安，……（应）以真理正义，导诱人民，养成其（国民）优美纯一之概念”，惟有如是，才能使“庶全国合为一体，政府与国民，亦有指臂相连之谊，对内对外，均足保持其独立之资格，而不致失坠也乎。”^[5]

（三）“智情意一浑圆态”，培养“精确、正当、稳健”之社会心理

在杜亚泉看来，与个人心理分为智情意三大端一样，社会心理亦分为智情意三大端，即社会知识、社会感情、社会意思。智识者，所以开浚社会之精神；感情者，所以推动社会之精神；意思者，所以表示社会之精神。“社会智情意三者是互为关系的。如社会感情，无适当之社会知识为之指导，则感情易流于偏倚；反之，社会知识，无适当之社会感情为之调和，则知识必归于枯寂。又如社会意思之发动，亦赖社会知识之指示，否则为妄动、为盲从，均是贻社会发达之障害。”^[2]正是因“三者互为补救，互为调剂”，所以社会精神，“乃完全发达而无过不及之弊焉。”鉴于社会智情意三者之互为关系，杜氏指出，若要纠正国民“幼稚而静默”之社会心理，培育国民“精确、正当、稳健”之社会心理，应使社会心理三大端“智情意一浑圆态”，而不得有所偏颇。改善之法主要应关注如下：（1）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而言，“改善社会精神者，有伦理的改善、宗教的改善、审美的改善、政治的改善、经济的改善、教育的改善之种种”，只要“诸法互用，乃能收美满之效果，此固根本上改善之方法。（2）就目前现状而言，治标之策，则“必以开通知识为前提，而尤以普浚常识为急务。”然在诸方法中，以教育的改善，为最适当最切合之方法。杜氏认为，此处所指教育，“务使社会的个人，感受教育的影响，各具相当之常识，庶感情意思，得以指导，不至为盲从、为妄动，当然“不得以教育为当务之急，而概弃其余也。”惟有如此，“则中国社会心理，其或有精确正当稳健之一日。”^[2]

(四) 树立“矛盾”“冲突”意识, 培植“中正”之奋斗精神

杜亚泉面对“吾国今日, 几乎无人不抱悲观主义矣, 委心任运, 颓废因循, 无贤不肖, 殆同一辙”和“非奋斗不足自存”的现状, 指出“吾人既已生活于世界, 即当不问世界之何苦, 随其趋势, 奋斗以图存, 不能因情事转移, 志望断绝, 而有所推诿。”“人当知矛盾乃天演所必不可逃, 冲突为人世所必不能免, 要贵有尽力乎其间者, 斡旋补救, 以减杀其祸患, 遏止其潮流, 则冲突之余, 未尝无调和之希望, 矛盾之后, 或可有融洽之时期。”此应“为吾人所宜自觉者。”^[6]为了培植国民“中正”之奋斗精神, 国人必须充分认清对“奋斗精神”之误解, 即认为“一经奋斗, 即可拨乱而致治”, 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颓废因循, 固足以取侮, 而卤莽凌躐, 亦不足以救亡”, “奋斗愈烈, 则危险愈甚, 如汽车之轱出轨途, 机轮之失其调节, 未有不僨事贻祸者也。”所以, “奋斗之中, 固自有其中正之道, 而不容或忽者。”^[6]从而杜氏认为, 要想培植国民“中正”之奋斗精神, 应关注以下几方面:

(1) 奋斗之途径。杜氏认为, 政治虽然是“救国”之途径, 但并非所有事情都归于“政治生活”, 政治乃“事务执行之机关, 而非质力发生之产地, 必民力充牣, 百务振兴, 而后政治乃有所凭借。”所以, 奋斗之途, “不特不宜专求诸政治, 且决不能求诸政治也明矣。”实际上, “农工商贾、社会家庭, 在在具奋斗之机能, 亦人人有奋斗之义务。”“吾人但各就现有职业、现有地位, 随时随事, 勉力焉可矣。”也惟有如此, 才能“为途之宽, 为力至易, 人尽可能, 决不宜囿于一隅, 亦不容以机缘未遇为借口也。”(2) 奋斗之手段。杜氏认为, “自竞立争存之学说输入吾国以来, 国民颇承其弊”, 以为“奋斗云者, 不过致自己于优胜, 陷他人于劣败而已。”其实, 人类社会, 必须以共同生活为前提, “而共同生活, 要以不相侵夺为原则。”所以, “吾人今后奋斗, 不可不笃守此旨, 一切排挤倾陷之术, 均宜屏斥。”同时, 培植“奋斗精神”, 还应“惩忿窒欲, 忍性动心”“守正义, 重人道, 维持协力之主义”, 以振刷内部之精神, 排除培植“中正”之奋斗精神之障碍。(3) 奋斗之界限。鉴于西洋奋斗之精神具有“抑人扬己”侵略主义倾向, 杜氏明确主张, 吾国奋斗之精神, 应“以不相妨碍为界限,”原因在于, 当前我们国家“智德未进, 人民行动, 易走极端, 若但倡言奋斗, 不加裁制, 则变本加厉, 转以启自相残杀之风, 而陷于悲惨无情之境地也。”所以吾国国民从事于奋斗, 必当守持界限, 即“对内则以不相侵害为依归, 对外则以毋召恶感为要旨,”以“于欧风美雨之中, 免社会之飘摇, ……养成奋斗之精神。”^[6]

三、国民教育应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

为实现陶铸理想国民的目标, 杜亚泉强调国民教育还应积极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 以培植国民教育根基和营造国民教育良好氛围。

(一) 注重教育普及, 培植国民教育根基

杜亚泉深知国民素质高低关系到风俗良窳, 人才盛衰, 国家强弱。而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在于教育普及, “夫教育云者, 非限于学校教育已也, 宜兼及于社会教育; 且非指高等教育而言也, 宜注重于普通教育。务使社会的个人, 感受教育的影响, 具有相当之常识”。^[2]为了实现教育普及的目标, 杜氏做了很多努力。(1) 兴办学校。兴办学校, 栽培社会需要之人才, 是杜氏一生的一个重要理想和追求。早年他与蔡元培在绍兴办中西学堂, 后在上海创办亚泉学馆; 1903年, 与绍兴文化教育界人士王子余、寿孝天、宗能述等创办越郡公学; 在任绍兴七县同乡会议长期间, 还办了小学3所; 1924年, 又在上海创办了新中华学院。杜氏的这些办学活动, 多因经费不济等原因而未能持久, 有的存在时间很短。但他办学之志, 始终未泯。(2) 主编和创办报刊杂志。近代以来, 报刊杂志是教育普及的一个重要媒介, 杜氏把这些影响、教育人们的媒介称为“便利社会间心理之交通”, 主张“以便利社会间心理之交通(如学会、讲演会、宣讲社、书籍、报章、杂志等, 皆为心理交通之机会), 促进社会之普遍化使社会中各个人之心理, 渐渐融洽。”^[7]杜氏主编《东方杂志》和创办《亚泉杂志》(后改名为《普通学报》)的重要目的就是力图通过杂志这一大众传播媒介, 让更多的人关心时政, 开阔视野, 促使他们从保守封闭的思维模式和生活圈子里走出来, 真正感受时代的变化, 接受新文化的

熏陶。(3)大量编撰教科书。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担当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任,承担了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其作为拥有最大受众市场的读本,不仅惠及各类学堂的学生,其思想内容还对社会产生辐射力,成为社会变革和不同群体的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杜氏热切希望基于大量编撰教科书,更新国民教育的内容,使“吾朦胧无意之国民,注目于未来之大势,预备为科学的劳动家,以作二十世纪之主人焉”。^[8]为此,杜氏积极参与其事,特别是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长达28年的编译工作中,编译发行了大量科学书籍及语文史地等教科书。据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王云五称,杜氏“三四十年来编著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百数十种”。^[9]难怪胡适先生曾感叹:“这个编译所确是很要紧的一个教育机关,一种教育大势力。”^[10]所以,若说商务印书馆为民国时期全国教科书及参考用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出版起了奠基作用,则杜氏作用功不可没。

(二)力倡教育体制改革,营造国民教育良好氛围

为提高国民教育质量和营造国民教育良好氛围,杜亚泉力倡教育体制改革。杜氏明确指出“中国教育的弊病首先在于国家对教育的导向有错误”。^[11]即“出身之奖励”。由于国家这种奖励政策,导致一些青年虽在新式学堂受教育,即使受西方教育,回国后也要求政府以相应的功名奖励,以得到社会的承认。杜氏认为要改变这种弊端,极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应提倡“教育之基础,当立于国民生活之上,不当立于官吏进身之上”。因“现在的青年,皆未来日之主人,所怀抱于未来之世局,较吾侪为甚。若仍施以旧时之教育,悬官吏为目的,行之于希荣干禄之途,是不啻对于后日之社会播散骚乱之种子”,故此点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责任所在”。其次,杜氏认为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病在于“政府对教育干涉过多”,“教授必用何项之书籍”,“教师必具如何之资格”,“教科书必如何分配”等等,导致人们学习内容受到限制,学习目的发生偏差。因而他主张:今后“凡关于社会所经营之教育事业,宜力主放任,去其干涉之手段;关于政府所经营之教育事业,宜力求进步,尽其诱导之责任。”因“教育之价值,即以其对国民生活上之价值为标准。所以学堂之所教育,有益于国民之生活也,则自然臻于兴盛,无待政府之提倡也。”他对政府所经营之教育事业设计了一套改革方案:(1)京师大学堂为全国学堂之中枢,京师师范学堂为全国教育之根本。由政府尽力扩充,以求完备,使其“内足以系全国士林之物望,外足以与欧美著名之大学并驾齐驱”;(2)在地方,“政府应设规模较备之学堂于交通较便之地,以远大之眼光,求学术之进步,谋共同之发达”。这是杜亚泉对近代教育体制改革进行探讨的有益尝试。

综上所述,杜亚泉基于中国国民性和教育现状的深入体察,其关于国民教育的思想,对于唤起国民的觉醒,对于国民素养的提高和中华民族的振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下,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人的素质的竞争,批判地继承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塑造合格公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杜亚泉基于中国国民性和教育现状的深入体察,其国民教育思想深刻而丰富,对近现代中国国民教育事业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杜氏国民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从国民性格的深层结构来寻求国家积弱的内在原因,探求救国救民的途径,以深刻的民族自省冲击了顽固的民族偏见,标志着近代国民教育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其次,杜氏国民教育思想是追求人的现代化的进步思潮。其从新的角度去探寻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从更深的层次上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把人的现代化提上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议事日程。再次,杜氏关于国民教育思想的思考揭开了改造中国人传统行为方式和社会心理结构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也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情。最后,杜氏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为了使国民教育的开展具有良好的体制和机制氛围,还积极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所有这些均充分证明杜氏国民教育思想丰富、深刻而前瞻,其是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众所周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民教育的发展,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既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更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的

基础。中共十七大报告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中,提出了“使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更加完善”的教育发展目标。这一目标既是对我国现代一系列教育改革、发展思想和实践的高度概括与升华,又是对国民教育问题的有力回应。在此意义上说,杜氏对国民教育的探求与当前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具有共通之处,对当前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依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由是观之,杜氏国民教育思想不仅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国民教育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且对当下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杜亚泉. 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J]. 东方杂志, 1917, 14(9): 1~4.
- [2] 杜亚泉. 论中国之社会心理[J]. 东方杂志, 1913, 9(9): 4~7.
- [3] 杜亚泉. 个人之改革[J]. 东方杂志, 1914, 10(12): 1~4.
- [4] 杜亚泉. 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J]. 东方杂志, 1912, 9(5): 4~7.
- [5] 杜亚泉. 国民共同之概念[J]. 东方杂志, 1915, 12(11): 2~5.
- [6] 杜亚泉. 吾人今后之自觉[J]. 东方杂志, 1915, 12(10): 2~6.
- [7] 杜亚泉. 精神救国论(续二)[J]. 东方杂志, 1913, 10(3): 3~8.
- [8] 杜亚泉. 未来之世局[J]. 东方杂志, 1917, 14(7): 1~6.
- [9] 田建业. 杜亚泉文选[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130.
- [10]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575.
- [11] 杜亚泉. 论今日之教育行政[J]. 东方杂志, 1911, 8(2): 16~20.

On Du Ya-quan's Thoughts of National Education

XU Mu-xing^{1,2}

(1. Research Center for Higher Learning Development,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Faculty of Education, Zheng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0, China)

Abstract: Du Ya-quan's profound thoughts of national education are characteristic of pushing forward societal reform, remolding national character to cultivate ideal citizens, and advocating mass education and reform of educational system, thus being suggestive towards today's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progress.

Key words: Du Ya-quan; national education; remolding national character; ideal citizen

(责任编辑 裴云)